

西哈努克的政治思想述评

吴 献 斌

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1922—)曾任柬埔寨国王、首相、国家元首。在柬埔寨的政治舞台上活动近50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他不仅领导完成了柬埔寨的独立事业,而且为巩固独立、建设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他两度与左派力量合作,进行了抗击美国、越南侵略者的斗争,赢得了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尊重。他虽然没有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但从他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中,我们不难窥其一、二。

一、西哈努克的生平事略

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10月31日出生于金边柬埔寨王族的一个亲王家庭,父亲是诺罗敦·苏拉玛里特亲王,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是当时在位的柬埔寨国王。1936年西哈努克14岁时,去法属印度支那最好的法文学校——西贡的沙士鲁·罗巴中学读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富有教益的岁月”^①。1941年3月,泰国在日军的支持下,出兵进攻柬埔寨,法国维希政府被迫与泰国在日本东京签署条约,强迫柬埔寨负担战费、割让 $\frac{1}{3}$ 的领土给泰国,柬埔寨的老国王西索瓦·莫尼旺羞愤而死,年仅18岁的西哈努克被法国人操纵的王位最高委员会“选举”为新国王,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多姿的政治生涯。

1941年10月31日,19岁整的西哈努克加冕登位。他登位之初,正值二次大战战火炽燃,日寇猖獗之秋,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使这位年轻的国王饱受辱凌。1945年3月9日,日本在柬发动政变,取代法国控制了柬埔寨,并“通知”柬埔寨“独立”。3月13日,西哈努克宣布民族“独立”并颁布法令废除了1863年的法柬保护条约和1884年协议,但是“这个独立只是一棵空心大白菜”^②,柬埔寨刚脱龙潭,又入虎穴,日本在柬埔寨的统治更为残酷,西哈努克的处境更加艰难。日本法西斯投降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1946年1月,法国与柬埔寨签署了一个临时协定,把柬埔寨变成了法兰西联邦的“自治国”,国家的主权仍操在法国人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柬埔寨人民使用各种手段开展了反法斗争,西哈努克也顺应时代潮流,为争取柬埔寨的独立而奋起抗争,奔走呼号。1949年11月,西哈努克与法国总统欧里奥尔签署法柬条约,宣布柬独立,使柬享有部分主权。1952年9月,西哈努克在致高棉人民的文告中,保证至多用3年的时间,从法国手中收回全部主权。1953年3月他亲赴法国,要求完全独立,但遭到拒绝,西哈努克愤起反击,开始了所谓的“独立十字军远征”,即周游加拿大、美国、日本、泰国,呼吁世界舆论支持柬埔寨争取独立的斗争,向法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1953年,法军在越南战场连连失败,柬国内反法斗争风起云涌,在各方面的压力

下，法国被迫与西哈努克进行谈判，最后不得不接受了他的无条件移交全部主权的方案，同年7月3日，法国宣布给予柬埔寨以完全的主权和独立。11月9日在金边举行庄严的权力交接仪式，柬埔寨终于赢得了独立。

1955年3月2日，西哈努克突然宣布自动逊位，把王位让给了他的父亲。同年4日，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并在9日的大选中获胜，他以该盟主席的身份受命组阁。1960年4月，其父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引起了一场王位危机，西哈努克力排异议，拒绝了要他重任国王的要求，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使国民议会修改宪法，设置国家元首。9月14日西哈努克通过法律程序，就任国家元首，至此，他的地位更加巩固。

美国为其反共战略和政策服务，肆意干涉柬埔寨内政，1963年西哈努克断然停止了美国的“援助”，赶走了美国300多名“援助专家”，1965年5月鉴于美机频繁轰炸柬埔寨领土，西哈努克宣布断绝与美的外交关系，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

60年代末，西哈努克对国家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国内在派势力日益坐大，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偕夫人在国外之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废黜了西哈努克。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庄严声明和告柬埔寨全国同胞书号召打倒朗诺政权，宣布建立他任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4—5月，美国和南越伪政权先后出兵侵入柬埔寨。同年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宣布成立，西哈努克担任国家元首。该政府陆续得到了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为了协调抗美力量，在西哈努克的倡导下，1970年4月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北两方召开了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为三国人民的团结合作战斗揭开了新的一页。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解放了金边。翌年1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颁布了《民主柬埔寨宪法》，规定建立民主柬埔寨，同时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同年4月2日，西哈努克发表声明，要求“退休”，民柬政府很快宣布接受他的要求，并在内阁会议上建议授予他“伟大爱国者”的称号，为他树立一座纪念碑。由于柬共路线和政策的失误，在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西哈努克消声匿迹，其行动受到限制，他的一些亲属受到株连，几个子孙受害致死。

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6日西哈努克率民柬高级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越南罪行。此后，他宣布由于政见不同，脱离与民柬关系，并长期居住在国外。1981年3月26日，西哈努克在平壤宣布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团结阵线”并组织了一支归他领导的抗越武装力量。在此之前，他发展谈话，表示愿意领导“一个有红色高棉参加的联合阵线”。经过多次磋商，红色高棉、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派抗越力量，于1982年6月在吉隆坡签署《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7月西哈努克在解放区正式宣布成立联合政府，并任主席。西哈努克又一次和左派力量合作，站到了争取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最前列。1986年3月，西哈努克代表联合政府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8点建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987年12月和1988年1月西哈努克两次与韩桑林政权总理洪森在法国举行“私人会晤”，皆因洪森坚持顽固立场，使会晤未取得任何成果，一直到现在，他仍在为恢复柬埔寨的独立、统一、和平、中立和不结盟而进行着坚韧的努力。

纵观西哈努克走过的路，可以看出：尽管他出身封建国王，但始终顺应时代潮流，领导柬埔寨人民为争取和维护独立，为建设国家，为恢复主权与自由，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为柬埔寨民族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在柬埔寨现代历史上的地

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二、西哈努克的民族主义思想

西哈努克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他的整个政治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重要,而且在他争取和维护国家的独立自由,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1864年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以来,法国殖民者严密地控制着柬埔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无情的压榨和掠夺,使柬埔寨长期陷入贫困落后的深渊,严重窒息了这个曾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国家的生机。西哈努克虽身为国王,但只是一个有名无实,受制于人的傀儡。因此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是柬埔寨人民面临的最紧迫的历史任务,也是西哈努克努力争取的首要目标,他认为,“独立乃是最重要的问题。”^③他承认:“自从我当上国王的头几年起,我就得摸索如何获得独立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④

在西哈努克即位之初的几年,由于其所受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特别是柬埔寨国力孱弱,柬法力量对比悬殊,他的独立思想还很含糊,把柬的独立寄希望于法国和日本的恩赐上,听任法国、日本的摆布。二次大战结束后,柬埔寨人民的民族情绪高涨,在举国争取独立的浪潮的推动下,西哈努克的独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他坚决要求完全的独立,并为此而奔走呼号,竭尽全力。1946年初,他得知了法国想把柬埔寨由“保护国”变成“自治国”的打算后,反应“强烈”地说:“‘自治’这个词本身就说明:法国不承认我们的独立,然而我国人民和僧侣唯一能接受的东西就是独立。”^⑤1947年10月,法驻柬高级专员卢贝在致西哈努克的生日贺词中,为法的殖民统治辩护,认为柬的文明程度和军政管理人员的素质还没有达到独立的程度。西哈努克亲自起草一份讲话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的讲话“有如投下一颗炸弹”,使“卢贝先生难以抑制其不满情绪”,其随行人员“都惊呆了”,西哈努克认为,“不管柬埔寨是否有保证自己独立的物质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对其自决权提出异议……,我将至死毫不妥协地捍卫这一深刻概念。”^⑥

西哈努克开始从事独立斗争时,企图通过长期的耐心谈判求得独立,但法国根本不理睬他的要求;他还曾把独立的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等大国的支持上,结果也遭到冷遇。他后来回忆说:“对我进行政治教育的是樊尚·欧里奥尔(当时的法国总统——编者注)杜勒斯……等,在这些人眼里,独立问题是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根据他们的利益给或不给,根本不顾有关小国的利益。”^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被迫改弦更张,开始发动民众,组织民兵,训练武装,并离开金边避居外地,拒绝与法国人合作,向法国人施加压力。在越南和柬埔寨人民斗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终于获得了完全的政治独立。西哈努克深有体会地说:“这只是在将近50万柬埔寨人民集会支持主张在必要时得进行武装斗争的号召之后,法国人才开始对谈判表示出真正的兴趣。”^⑧“到11月9日,有关独立的所有标志都终归柬埔寨掌握了——不过这只是在对法国人进行某些军事摊牌,并由我军把某些法国部队解除了武装之后才实现的”。^⑨

如果说争取独立是西哈努克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章,那么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则是西哈努克终生奋斗的事业。

柬埔寨独立后,主权与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美驻柬大使麦克托林克公开宣称:他的“使命就是把柬埔寨变成另一座美国堡垒”。50年代,美国曾多方施加压力,想压柬埔寨

王国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威胁美国将不向走中间道路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美的企图遭到了西哈努克的拒绝。他对当面恫吓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干脆地说：“柬埔寨对东南亚条约组织一点都不感兴趣，作为中立国和佛教徒，我们会照顾自己。”^⑩他当时曾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人民要求独立而不受任何人的摆布，我作为首相，不能不阐明人民的愿望，在我们的国民大会上没有一个人举手认为应该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⑪为了摆脱美国的纠缠和压力，他甚至辞去了首相和外交大臣，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把和平中立政策定为柬埔寨的基本国策，并写进了宪法。

60年代初，所谓“自由世界”，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一方面又大造舆论，声称这是“维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西哈努克针锋相对地指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向往的自由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祖国的自由，也就是独立；另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也就是民主。”然而“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并不懂得，对殖民地和原殖民地人民来说，独立高于一切，一切是指民主、财富、福利以及社会秩序和安宁。”^⑫对亚非拉人民来说，为祖国争得独立是第一位的，而国内制度只是其次的，第二位的。”^⑬因此他明确指出：那种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式作法”或插手控制当地政府、行政机构、军队和警察的“英国式作法”“肯定是与一心一意为寻求真正独立的人民的强烈愿望格格不入的。”^⑭

对于美援，西哈努克意识到：美国的“经援”和“军援”，“都附带着与我们主权不能相容的条件”^⑮他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指出：美援是“有毒素的”，是美国的政治工具，是为了培养效忠美国的“政治上的第五纵队”，其用意是要把柬埔寨的经济纳入所谓的自由制度中去，并导致“丧失独立”这一“灾难性的后果”^⑯，鉴于此，1963年11月20日西哈努克召开人民社会同盟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断绝一切美援的决定，他庄严指出：“前途可能会有困难，但是我断言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们要实行并维持真正独立的话”。他说：“如果我们非死不可，我们宁可以一种比较勇敢和更有尊严的方式去死，而不愿被美援窒息而死或束手待毙。”^⑰后来西哈努克在评论这一决定时说：美国“以‘世界宪兵’自居，陶醉于自己的军事、经济和财政力量，绝不容许它惠予一点资金援助的小国实行独立政策，这种可悲的意识，就是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与美国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不和，最后导致两国分手的根源。”^⑱

1965年美国在南越开始进行所谓“局部战争”，并派飞机不断轰炸柬埔寨，5月3月柬埔寨与美断交，西哈努克在回顾这一“历史性决定”时说：“我有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最后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一点点民族尊严，除了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外，别无他择。”^⑲这个行动充分显示了西哈努克维护独立和主权的决心和勇气。

“3.18政变”后，美国和越南阮文绍政权先后派兵侵入柬埔寨，面对强敌，西哈努克维护独立主权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反而以更加勇敢的姿态投入了战斗。他和左派力量捐弃前嫌，共组成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进行抗美救国斗争，他连续发表数十篇告柬埔寨同胞书充分表达了他的高度爱国热忱和恢复国家主权的决心。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他被授与“伟大爱国者”的称号，是对他思想和活动的中肯评价。

1979年，柬埔寨又一次面临民族灾难，越南出兵侵占了柬埔寨，西哈努克再次超越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挺身而出与红色高棉和宋双派组成了民柬联合政府，担当起了领导抗越救国的重任。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为维护和平和独

立而斗争；我国的主权和中立——而相形之下，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要衡量我过去30年领导柬埔寨的功过，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②9}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以经济独立来保证政治独立，也是西哈努克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

与他争取政治独立的思想相一致，他十分重视国家的经济独立。他说：“首先，我们的独立自然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恢复我们的主权），其次，表现在经济方面，这同样是重要的”，^③他把两者比作骑自行车，要是后轮（经济）不转，车子就无法前进。“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就是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不具备完整的主权，因为它要一切依靠外援。”^④他说：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应该设法从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因为独立的国家好比一间屋子，经济好比屋柱，如果屋柱不硬，那么这间屋子怎么会稳固呢？^⑤他认为：经济是政治独立和生存的基础，是民族尊严和自由的基础。而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特别象柬埔寨这样原来十分落后的小国。他认为：发展经济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线，1959年他在茶胶省参加体力劳动时说：“我们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有了经济独立才能保障政治独立。”^⑥

柬埔寨独立之初，国民经济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不仅法国资本仍在柬占重要地位，而且随着美援的进入，美国想借此支配柬埔寨的外贸和财政政策，向柬施加政治上的压力。针对这种情况，西哈努克确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基本方针。他坚定说：我们要竭尽全力自力更生地建设国家，我们的国家虽然弱少；但我们要作闪闪发光的钻石！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在工业上，西哈努克主张通过贷款扶植民族工业，通过国家控制进出口保护国内市场，并限制外资活动。他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工业家和制造商阶级而言，因此我赞成建立一些国营企业，同时协助发展私营部门的手工型小工业。”^⑦他主张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共同发展，互相配合和补充，其中60%的重要的和较大的企业由国家掌握，在工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1965年针对美援给柬经济造成的某些弊端，西哈努克提出：取消那些依靠外国外汇经营而不利于国家独立的工业项目，创建新企业要主要依靠本国原料逐步减少原料进口，以免浪费外汇。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的执政者，西哈努克非常重视农业生产，1956年他在国民议会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倘若抹煞农民对国家的贡献，那就难免要遭到国破家亡的厄运，因此我们要重视农民。他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措施有：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至1968年已组织起728个消费和生产合作社；提倡互助互救；发放低息贷款，仅1957年就向农业合作社发放约2607亿瑞尔贷款；减免土地税；提高农产品价格，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西哈努克还倡导兴修水利，培养技术人员，扩大良种种植面积，发展化肥生产，扩大耕作面积，努力争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规模扩种橡胶、棉花、咖啡、油棕等经济作物等等。

西哈努克也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58年，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主席的国家最高教育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建议教育的改革。他认为：国家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民从愚昧和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过有文化，有教养有，智慧的生活，免受外国的欺侮，使柬埔寨富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他还认为：教育是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很需要科技人才，这主要靠教育培养。西哈努克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收到了很大成效。

三、西哈努克的和平中立外交思想

西哈努克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有着重大影响,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他在从事外交活动的过程中,根据柬埔寨的具体情况,较早地提出了和平中立思想,这也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53年9月柬埔寨独立前夕,西哈努克就授权宾努首相发表声明,宣布柬在法国和越盟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1954年的关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西哈努克承诺柬埔寨保持中立立场。1955年3月西哈努克逊位后前往印度访问,当时尼赫鲁“极力奉劝”他在外交方面推行中立路线,他说:“我脑子里也恰好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他对我采取中立政策是有影响的”^{②0}。嗣后,西哈努克率团出席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坚持中立政策的声明。后来,在他的一些讲话和外交活动中,又把和平中立政策的内容加以具体化。1956年4月,执政的人民社会同盟通过了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执行严格中立政策的决议,这次大会被西哈努克认为是“柬埔寨对外关系中一个历史性转折点”。^{②1}1957年8月柬第三届国民议会通过关于执行中立政策的法案,后来这个法案被纳入了宪法。西哈努克认为这个法案“将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一块奠基石”^{②2}。

西哈努克和平中立思想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演变过程。从他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和平中立思想的主要特征。

他早期的中立概念,主要是指“不偏不倚”地走中间道路,即在万隆会议上所声明的那样:与东西方都保持友好关系而不介于他们之间的冲突。他在1956年访华时指出:“柬埔寨的政策是忠于和平、中立而不参加任何集团,以及对一切国家同样友好的态度。”^{②3}

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使用各种手段压柬埔寨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老挝局势恶化、越南战争逐步升级,西哈努克的中立概念也增添了新的含义,即不仅只为本国的利益而坚持和平中立,还要从维护本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敢于主持正义、敢于进行斗争,也就是积极的中立。美驻柬大使曾当面威胁西哈努克:“不能想象在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在这场斗争中,不站在美国一边就等于反对美国。”^{②4}与此同时,美国支持泰国、南越对柬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柬国内以山玉成为代表的反对派势力也加紧活动破坏中立政策。面对国内外势力的严重挑衅,西哈努克毫不畏惧地表示:他永远不做任何外国的附庸,只要他活着、就要把坚持中立和维护独立的斗争进行到底。对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他组织了坚定的反击,并取得了胜利。他说:“对我来说,中立既不意味着利己主义和忘恩负义,也不意味着对正义和非正义的不加辨别。”^{②5}1965年,美国在越南把“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西哈努克立即发表讲话,“支持越南爱国者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说:“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在侵略者(美国)和被侵略者(越南)之间保持中立,因为被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所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权利)和非正义(美国对越南实行新的殖民主义)之间保持中立。”^{②6}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西哈努克的和平中立概念越来越具有反帝、反霸(包括地区霸权主义)的色彩。他认为:根据各国的情况和意愿,中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它必须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由于帝国主义是干涉的同义语,所以亲帝国主义的中立和中立

这个名词是矛盾的。”^③“3.18政变”后，西哈努克开始了他生涯中抗击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新阶段，他认为，美国粗暴地践踏了柬埔寨的主权，因此柬埔寨必须“与其他两国兄弟人民结成统一阵线并肩战斗，直到重新享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中立——这个中立既不会排斥反帝斗争，也不会排斥对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的声援。”^④他在1973年说：“柬埔寨已经选择了一种进步类型的中立，这是1970年4月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最后文件所表达的那种中立”。^⑤

总之，西哈努克的和平中立的概念，经历了一个由不偏不倚的中立，向既有鲜明的原则性又有强烈的正义感、坚定斗争精神和反帝反霸的积极中立的演进过程。

从这个演进过程可以看出西哈努克的和平中立思想有如下的内容：

首先，和平中立思想原则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生存发展的权利。西哈努克认为独立是最重要的，而要维护和巩固独立，最好的武器是实行和平中立的对外政策。暹罗（泰国）、越南在古代，法国在近代都曾侵略过柬埔寨，柬埔寨多次丧失主权和独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本国的条件和需要妥善地处理对外关系。柬埔寨现在是实力有限的小国，地理上又处于几个强邻的“夹缝”中，根据这些分析和自己多年的从政经验，西哈努克认为：中立是柬埔寨“作为独立和自由国家得以存在的唯一保证”，而卷入纷争难免会损害独立，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同中立背道而驰就意味民族灾难。”^⑥

其次，和平中立思想原则反对的对象是外国干涉侵略势力，即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就象他明确指出的那样：多年来直接威胁柬埔寨的主权和安全，损害践踏柬埔寨中立的“敌人”，五、六十年代是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国支持的南越、泰国；七、八十年代则先后是美国和越南。他曾在论及中立对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意义时指出：“在过去一百年中，挑起敌对行为和使我们进行自相残杀的，正是帝国主义。中立是使这个地区能进入和平稳定时代的最好的保护伞，使不怀好意者不敢问津。”^⑦“中立是使东南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在保护他们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同时，又不受超级大国控制的最好保证。”^⑧多年来，西哈努克正是以和平中立为武器，同这些外来的“敌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第三，和平中立思想原则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要求是：在坚持平等、和平、合作，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坚持不结盟立场。西哈努克在1955年3月访问印度时，与印建交，“并在联合公报中，规定我们的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⑨在万隆会议上，他发表声明说：“决心以奉行潘查希拉（即五项原则），参加中立的大家庭作为国策。”^⑩后来他反复重申：“我热烈赞同五项原则，因为我一贯信奉中立。”^⑪在五、六十年代，他曾经对近30个国家进行了访问，以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访问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虽致力于同各国发展关系，却拒绝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缔结政治、军事同盟，甚至在重压下也毫不妥协。他以不结盟来保持柬埔寨的中立。他说：“在我的运动中，我特别强调人民社会同盟是中立和不结盟的忠实信徒。”^⑫1956年他访问南斯拉夫时，仅在尼赫鲁、纳赛尔之后几天，他就与铁托签署一项关于不结盟问题的联合声明，反对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倡议各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以维护世界和平，声明认为柬埔寨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中立政策时，已走进了不结盟俱乐部的大门。许多亚非拉国家和铁托都承认西哈努克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第四，维护和平中立思想原则的手段是当国家遭到侵略、民族独立受到威胁和破坏时，一方面进行正义的自卫战争，反对一切人侵势力，另一方面在斗争中积极争取各国人民和友

好国家的支持。1957年，国民议会通过的西哈努克主持制定的《中立法案》规定：柬埔寨是一个中立国家，它不侵略任何别的国家。但如果自己成了侵略对象，它保留下列权利：进行武装自卫；呼吁联合国予以援助；吁请能够击溃侵略者的友好大国给予援助。后来的事实表明：西哈努克和柬埔寨人民也是依此去行动、去斗争的。这说明：和平中立思想不是和平主义，更不是投降主义。

第五，和平中立思想原则的应用范围是广阔的。它虽然是指导柬埔寨对外政策的原则，但决不意味着只狭隘地关心本国独立安全和民族利益。1960年，西哈努克不顾法国的不满，毅然决然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这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南非阿拉伯国家，他认为：“这是对一个要求恢复自己独立的民族应采取的正义立场”。1962年1月，他首倡并主持召开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谈，达成了万象三亲王建立中立联合政府的协议，使这个面临内战国家的紧张气氛得以缓和，维护了本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他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顶住压力，拒不在1963年莫斯科三国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所有这些都说明：和平中立思想主张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干涉、颠覆和侵略。在国际事务中是非分明，仗义执言，申张正义，主持公道。关注，支持在本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进步事业。

四、西哈努克政治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特点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柬埔寨政治舞台上一直扮演主角的西哈努克无疑是个复杂的人物。人们对他毁誉不一，对他的思想更是见仁见智，那么我们对他的政治思想该如何评说呢？

民族主义思想是西哈努克政治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指导柬埔寨产生了实践上的卓著成效。1953年，柬埔寨完全独立，这是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标志着长达百余年的法国殖民统治在柬埔寨的终结。柬埔寨从此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以一个独立的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在西哈努克执政时期，柬埔寨工业从无到有，建立起了民族工业的雏型；农业生产面貌有了较大改观；在文化教育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二名柬埔寨人在法国获得学位，全国没有大学，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到1968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6174所，其中大学9所，学院48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王国政府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表彰其在国民教育和扫盲方面取得的成绩。到70年代初，柬埔寨国民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欣欣向荣，社会进程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柬埔寨自吴哥王朝以来最为升平的一个时期。也是五、六十年代亚非新兴国家发展较为成功的少数例子之一，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如果把西哈努克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活动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其积极意义更显而易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地区的广大国家和人民民族意识极大提高，争取独立和自由洪流势不可挡，绝大部分亚非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相继通过各种方式赢得了独立，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世界历史上肆虐近500年的殖民时代宣告结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获得了政治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致力于发展经济文化，摆脱落后状态，以巩固政治独立，这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西哈努克的民族主义，是与这个大趋势相一致的，他领导柬埔寨人民争取维护独立，发展经济文化不仅符合柬埔寨人民利益，也是战后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新兴国家争取彻底独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哈努克的和平中立思想更具有进步意义。五、六十年代，他坚定地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给柬埔寨带来了安全、荣誉和尊严，大大提高了柬埔寨的国际地位，使五、六十年代的柬埔寨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成为著名的“和平绿洲”、“东方瑞士”；和平中立思想还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战后少数大国垄断国际组织，操纵国际事务，强权政治依然盛行。同时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国际形势持续紧张。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虽已独立，但在国际社会中倍受歧视，没有发言权，而且在东西方的对峙中左右为难，时遭威胁和损害。因此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把和平、中立、不结盟作为他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终于形成了60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成为反殖、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西哈努克的和平中立思想正是这一世界性政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全面深入地分析西哈努克的思想，还可以看出其下列几方面的独特之处：

第一，他的思想包裹着一层浓厚的佛教外衣。他为长期执政的人民社会同盟规定的指导思想是佛教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党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参照关于社会方面最先进的佛教教义”。^③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而他把自己的几乎所有思想和活动都与佛教教义联系起来，从佛教那儿寻找根据，进行解释。在谈到用佛教教化人民时，他说：“把佛教教义用于我们的国家政策方面，就能为我们培养出为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而战的、可靠的、得力的战士”，对内去争取幸福，对外去捍卫独立。^④他认为，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对待其态度是遵循佛陀的“不对别的教派说三道四，不诋毁他们”的教导，只要共产主义“不攻击我们，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最友好地同它相处”。^⑤他把自己和平中立思想、柬埔寨自力更生的方针、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归源于佛教教义和佛祖的教诲，^⑥他甚至认为佛教是“一种能够激励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宗教。^⑦他高扬佛幡，一个原因是他自少生活在浓重的佛教氛围中，深受其熏陶，抚育他的曾外祖母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在登位之后，为了还愿曾入寺披剃为僧三个月。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柬埔寨是一个佛教势力很大的国家，“佛教僧侣主宰着至少90%以上的柬埔寨人的思想”。^⑧要想维系人心，巩固统治，必须借助了这个现成的武器。尽管有人认为在柬埔寨，佛教“是一种有着人道主义和民主内容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力量”。^⑨但作为一位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把佛教教义作为其思想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局限。

第二，西哈努克的思想，有一定的亲法倾向。他承认：“直到1947年10月31日以前，我一直是一个顺从的君主，对法国人的建议更是俯首贴耳，因为我对法国人一直是很尊敬和很有感情的”。^⑩他对法国的保护制度评价颇高，认为1884的法柬条约“有一个功劳：即使柬埔寨从封建社会中摆脱出来，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模仿法国模式的，符合柬埔寨佛教国家特点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现代化国家”。他认为由于法国在1947年推动和参与起草了第一部柬埔寨宪法，因此“当时的法国政府”“是柬埔寨民主之父”。法国著名记者让·巴雷在《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的序言中写道：“不管如何，只要西哈努克执政，他就不会掩饰对法国的那种偏爱的感情”。“在整篇的回忆录中、亲王对法国人的友谊都已充分表达出来了”。西哈努克之所以可此，原因也很明显的：他父母以亲法著称，他自己也接受了良好的法国教育，并两度在法国索米尔军校短期留学，而且他的王冠还是法国人“出人意料地”给戴上的。虽然他对宗主国的好感是“很自然的”，但这却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彻底性。

第三，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君主制的基础上的。

民族主义发轫、成熟于近代西方，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外族压迫，争取自由、独立、统一的斗争武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一切不愿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阶级、阶层都参加了反帝阵营，特别是东方国家，封建君主也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跻身其列，这突出反映了反帝的广泛性和鲜明的东方特色。但国王君主只是反帝力量的同路人，他们参加反帝斗争带有明显的自私目的，就是争取对国家的完全统治和巩固自身的地位，西哈努克正是如此。

西哈努克登位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力以赴地争取独立，柬埔寨独立后，他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他仍嫌权力不够集中，后来几经努力，创立了一套特殊的政治体制，就是以人民社会同盟为工具，紧紧控制国家政权，来贯彻他的意志。1960年，其父苏拉玛里特国王去世，面对废除君主制的呼声，他“力主保留君主制”，后来西哈努克就任国家元首，但仍“拥有君主的权力和特权”，实际上还是君主制，他在执政期间采取的诸如打击右翼反对派，镇压红色高棉等行动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断绝美援等措施被国际舆论认为“表现了一个旧君主捍卫君主制和佛教传统的决心”，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些都反映西哈努克的阶级局限性。当然我们指出这些局限，并不是意味着否定他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方面的积极意义，而是为了更科学、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这个复杂的人物。

注 释：

- ①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 ② 同上书：第116页。
- ③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1页。
- ④ 同上书，第151页。
- ⑤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 ⑥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 ⑦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页。
- ⑧ 同上书，第165页。
- ⑨⑩⑪ 同上书，第165—166，72，18页。
- ⑫⑬⑭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84页。
- ⑮ 同上书，第338页。
- ⑯⑰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4，143页。
- ⑱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 ⑲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6页。
- ⑳ 同上书，第6页。
- ㉑㉒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 ㉓ 转引自谭实等：《柬埔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 ㉔ 转引自《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三期，第63页。
- ㉕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 ㉖㉗㉘ 同上书，第174—175，83，88页。
- ㉙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
- ㉚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
- ㉛㉜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1，395页。
- ㉝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8页。
- ㉞ 《人民日报》，1970年4月28日。

- ⑤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8—279页。
- ⑥⑦ 同上书，第279，278页。
- ⑧⑨ 同上书，第278，175页。
- ⑩ （美）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美国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 ⑪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
- ⑫ 同上书，第248页。
- ⑬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 ⑭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
- ⑮⑯⑰ 均同上书，参见第295—306页。
- ⑱ 同上书，第82页。
- ⑲ （澳）威·贝却敌：《沿湄公河而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 ⑳㉑㉒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30，152页。
- ㉓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7页。
- ㉔ 同上书，第178页。

上接第40页

- ④ 见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 ⑤ 见Robert J. Goldstein,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London: Groom Helm, 1983)。
- ⑥ 见J·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商务印书馆1989版，第64—65页。
- ⑦ 见Groham Adams, 《The Age of Industrial Violence, 1910—1915》(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866)。
- ⑧ 见H.C. Peterson和Gilbert Fite合著的《Opponents of War, 1917—1918》(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7)。
- ⑨ 见张红路：《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 ⑩ 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三联书店1974年中译本，第344页。
- ⑪ 见Robert Sklar, 《Introduction to the Truman Era by I.F. Stone》(New York: Vintage, 1973)，第4页。
- ⑫ 见阿瑟·林肯·威廉·卡顿：《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页。
- ⑬ U.S. Senate, 94th Congress, 2d Session, Fin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nomiittee, Report NO. 94—755, April 26, 1976. P139—216。
- 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7—648页。